

教—育—史—学—研—究—新—视—野—丛—书 周洪宇 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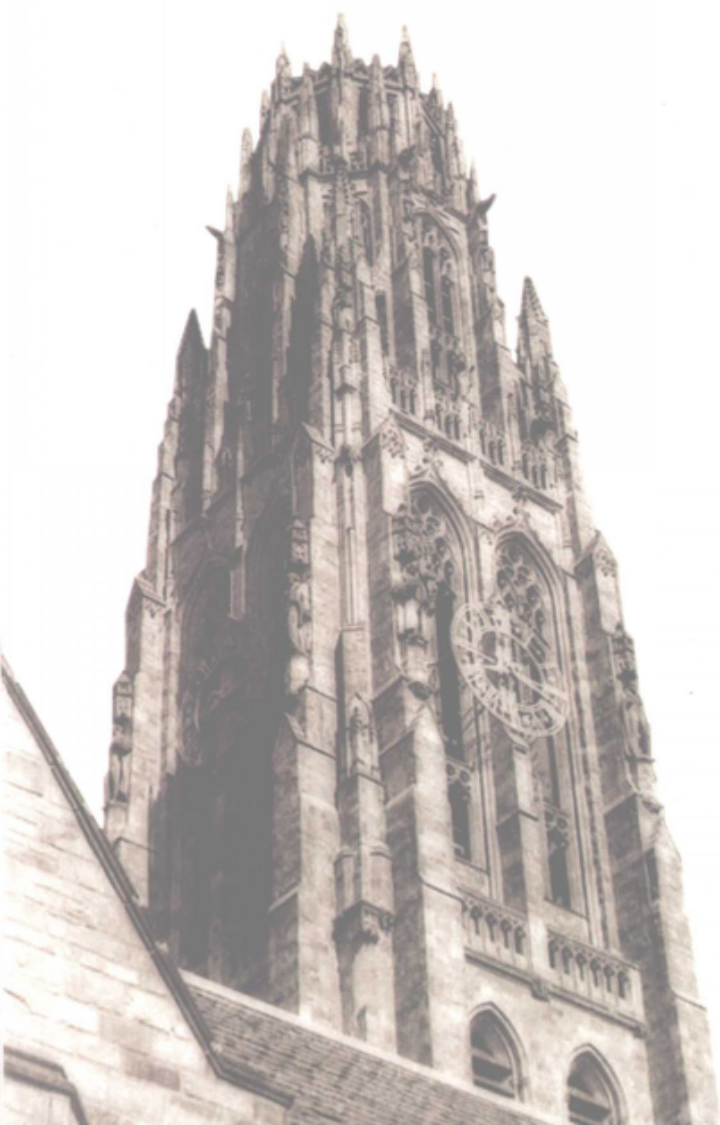
雅礼

与中国

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

(1906—1951)

赵厚鵠 / 著



- | | |
|--------------------------------------|-------|
| 反思与探索——教育史学元研究 | 郭 姪 著 |
| 话语与权力——中国近现代教育宗旨的话语分析 | 但昭彬 著 |
| 重振与衰变——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研究 | 广少奎 著 |
| 雅礼与中国——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 (1906—1951) | 赵厚鋈 著 |
| 合作与共进——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对华活动研究 (1922—1951) | 肖会平 著 |
| 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 | 中国昌 著 |
| 开拓与创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 | 周洪宇 著 |
| 融通与创新——陶行知与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 蔡幸福 著 |
| 革故与鼎新——科学主义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改革研究 | 耿红卫 著 |
| 启新与拓域——中国新教育运动研究 (1912—1927) | 汪楚雄 著 |

雅礼与中国——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 (1906—1951)

内容简介

本书以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为主要观照对象，从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宏观视野出发，具体研究了雅礼会及其在华教育事业之缘起、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中国化与世俗化的发展轨迹以及专业化的发展历程与具体表现等内容。

雅礼会1902年成立于美国耶鲁大学，其初衷在于通过来华办理教育和医疗事业，达到其传教目的。它先后在华开办了雅礼大学、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湘雅护校以及参与办理华中大学等学校。其在中国事业长达半世纪之久，产生了不可磨灭的积极影响。

责任编辑 / 王 慧 装帧设计 / 唐国峻

ISBN 978-7-5328-6002-9



9 787532 860029 >

定价：49.00 元

教—育—史—学—研—究—新—视—野—丛—书 周洪宇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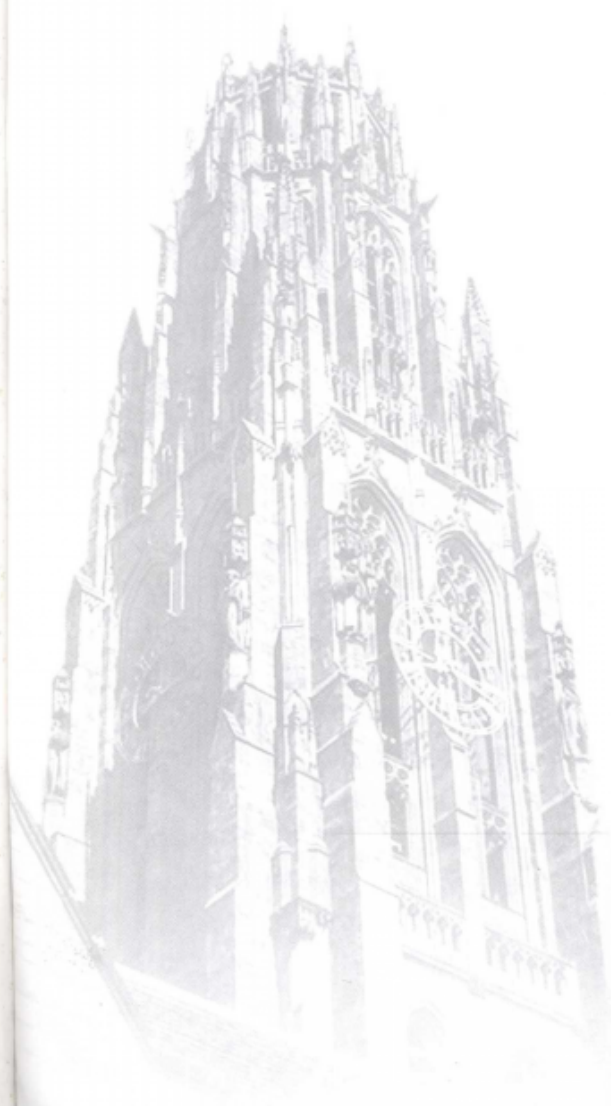
山东教育出版社

雅礼 与中国

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

(1906—1951)

赵厚鵬 / 著



雅礼与中国

——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906—1951)

赵厚麟 著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82092663 传真：(0531)82092661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规 格：787mm×1092mm 16开本

印 张：30.5印张

字 数：422千字

书 号：ISBN 978-7-5328-6002-9

定 价：49.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溪涧岂能留得住 终归大海作波涛

——“教育史学研究新视野丛书”总序

周洪宇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有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时间流逝，人事无常。历史尽管过去千万年，但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总是前后连续、割舍不断。

面对已逝的“人事代谢”和“往来古今”，今天的历史学家，包括教育史学研究者应当如何去记载和叙述？这是留给研究者永久的课题。教育史学要真实生动地记述成为过去的教育往事，探究历史真相，进而增强学科魅力，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学科反思，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适时地转换研究范式，通过借鉴新的理论和方法，开阔新的视野，使教育史学真正走出研究困境，步入新的天地，从而推动学科的整体发展。

—

教育史学是历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与历史学和教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从其发生的源头来看，教育史学是从历史学的大本营中分化出来，之后又在各国教师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成长壮大的。因此，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直接受到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现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明显左右着世界教育史学研究发展的基本走向。教育史学作为历史学的子学科之一，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总是像母子一样与历史学相随相伴，史学理论的每一次革命都牵动和影响教育史学的发展与进步。因此，欲理清教育史学的发展脉络，必然要关注与追溯历史学的发展轨迹。

教育史研究最早始于西欧，萌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滥觞于16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最初有代表性的成果是1517年出版的由戈莱(R.

Goulet)撰写的探讨巴黎大学起源与发展的专著,这是法国教育史研究的最早尝试,也是世界教育史学研究的开山作品之一。到了17世纪后半叶法国神父兼宫廷教师费洛尔在专门研究教会史之余,也研究法国的大学发展史,特别是他于1686年完成的《论学习的选择和方法》,从教育原理、教育方法论和课程论等方面,对古代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教育发展情况作了概要性的介绍,不仅介绍欧洲古希腊、罗马的教育,而且介绍了阿拉伯、法兰克教育,以及早期基督教教育和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情况,被当代美国教育史专家布里克曼(W. W. Brickman)称作是“最早的一部教育史”^①。尽管这些研究成果还只是对教育事件与现象的一般性描述,但毕竟在世界教育史研究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为后来系统、深入、全面地研究世界范围的教育史奠定了基础。

19世纪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历史学研究人员不仅注重具体史学研究,而且开始史学理论的建构,真正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并跃居人文科学之首位。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德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受历史学研究的影响比较明显。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半叶,德国成为欧洲历史研究的中心,以著名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方法成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与效仿的史学研究方法。兰克认为真正的研究必须要有可靠的史料,历史研究不能仅依靠引用几个权威人物的话语来得出相应的结论。他主张历史要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这就要凭借原始档案和文献资料来研究。他倡导的史学研究方法是采用“外证”与“内证”相结合的方法,“外证”法就是通过史料表现的形式,如语法、体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规范来确定史料的真伪,通过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互相校勘,使史料真伪得以明确展示;“内证”法通过对那些不同人所著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结合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各方面的考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同时兰克在柏林大学创办了历史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上百名知名历史学家,如魏茨、施密特、布克哈特等,所以汤普森说:“德国大部分伟大的史学家除少数例外,都是由他这位导师办的柏林大学研究班培养出来的。把兰克的弟子列一张表读起来就像一部史学界名人

^① W. W. Brickman, Early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and writing of education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edu.),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1982, p. 300.

录。”^①因此之故,兰克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此后,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再次将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推向新的高潮,这样,兰克学派的史学观不仅独霸德国史坛,而且统治了整个欧洲的史学界。

在19世纪,德国的教育史研究也不例外,直接受兰克学派的影响,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通过鉴别史料的真伪和考察史料记录者的动机来确认历史事实。这一时期教育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劳默尔(K. von Raumer, 1783—1865)从1842至1854年间陆续完成的《教育学史》四卷本,对从蒙田到裴斯泰洛齐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教育学科发展历程、技术教育、女子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德国大学的发展状况等一系列的内容均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挖掘。作者在占有充分史料的前提下,对欧洲乃至世界的教育学发展史和教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梳理。这部著作以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而展示了德国该时期的史学研究风格与特征,当时在欧洲产生了较大影响,1863年英国的非奇(L. W. Fitch)和帕金斯(F. B. Perkins)将其译为英文出版。在19世纪教育史研究领域,另一部影响较大的教育史巨著是《教育通史》(四卷本),这套教育通史是由德国教育史专家施密特(K. A. Schmidt)组织编写的一部大部头著作。他站在全球的高度去思考与审视教育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以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以及影响教育发展的社会因素为线索,纵论世界教育的发展脉络,既体现了该时期德国实证史学研究的风格,以丰富的史料展示教育史的本来面目,又显示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史研究的新趋向,由注重史料批判向分析解释史学过渡。还有1885年鲍尔生(F. Paulson)撰写的《德国学校和大学的学术课程史》,运用翔实的史料叙述了德国中等学校与高等学校的研究性课程发展与演变情况,一方面从教育学角度凸显了德国传统学术课程的重要价值,以此与巴西多的新教育运动与泛爱教育思潮相颉颃,另一方面从历史研究方法角度体现了德国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特色。

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的历史学”风行一时,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主流。由德国大学开始的历史学专业化趋势在西方各国得到普遍发展。19世纪美国教育史学在借鉴与学习德国史学的基础上逐渐兴起,在此过程中,H. 巴纳德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被誉为美国教育史学先驱。他对美国教育史学发展的重要贡献是编辑出版《美国教育杂

① [德]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下,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55页。

志》，提出向欧洲学习并创造独立于欧洲的美国文化的主张。《美国教育杂志》定位为研究世界各国及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的历史与现状，因而巴纳德被誉为美国教育史的开山鼻祖。到 19 世纪末，美国史学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一是非专业史学家让位于专业史学家，历史学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二是欧洲一些新的学术思想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的蔓延，英国赫伯特·斯宾塞的学说在美国得到广泛的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颇受美国学者的重视。尤其是德国兰克学派的治史理论与方法对美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历史学家不再把历史学作为文学的分支来看待，而是将其视为一门“科学”，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历史，而不是单纯描述历史的设想。至 19 世纪 70 年代，随着高等教育的变革，尤其是从德国引入的研究生院制度在美国建立，第一批由大学培养的专业史家开始在史坛崭露头角，其中包括一大批从德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他们主要供职于各个新兴的高等研究院和大学，以研究历史和培养专业史学人才为专职。1884 年，“美国历史学会”从“美国社会科学学会”中独立出来。1895 年，《美国历史评论》创刊。1907 年，专业的实证主义史家杰姆森当选为历史学会主席，标志着专业史家在美国历史学会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历史学终于由非专业史家让位于专业史家。

美国历史学的专业化对教育史学的专业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随着在历史、教育和社会科学方面有组织的学问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那些撰写教育史的人的思想以及他们的史作的性质。1899 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出现了最早的教育史博士论文。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 30 年教育史教科书及相关读本的陆续出版，正是与上述师范教育发展需要相联系的。第一本美国教育史教科书是布恩撰写的《美国教育》，旨在使美国教师了解美国教育史。第二本教科书是德克斯特（Edwin Grant Dexter）撰写的《美国教育史》。后来，孟禄（P. Monroe, 1869—1947）又于 1905 年撰写了《教育史教科书》，这些成为美国传统教育史学的典范。

当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垄断德国史坛之际，到 19 世纪末出现了以卡尔·兰普勒特（K. Lamprecht, 1856—1915）为首的新史学派与兰克学派的抗争，这场争论使德国传统史学在德国的统治板块开始松动。1891 年卡尔·兰普勒特以灵活的思维和善辩的口才与兰克学派的后继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卡尔·兰普勒特极力批判兰克史学只专注于政治史研究、精英人物研究，而忽视了对社会、文化的综合研究；只注重用史料来叙述历史，而忽略了对历史的分析与阐释。所以有人将这场论争

确认为“揭开了现代德国史发展的序幕,更是西方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全面抗衡的前奏”^①。从此,德国教育史学像历史学一样进入了由叙述式研究向解释性研究和由只注重教育内部研究向跨学科研究的过渡时期。

最早在这方面尝试的是1906出版的《德国教育的历史发展》,该书由鲍尔生撰写,他努力对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思潮与文化精神对教育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有意突破过去单一就教育而论教育的研究模式,力求拓宽教育史研究的视野,追求新的研究方法。1919年,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创始人斯普朗格(F. E. E. Spranger)撰写的《文化与教育》(Kultur und Erziehung)出版,书中通过对历史上重要人物思想的研究,深刻提示了文化与教育之间的血肉联系。斯普朗格力图打破德国传统的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新史学的宽阔视野去审视历史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并且运用分析与解释的研究方法去阐释教育史。如果说斯普朗格是从文化视角去研究教育史的话,那么赖希魏因(A. Reichwein)则是从社会学角度去探讨教育史的发展动因。赖希魏因具有广泛的研究视野,他一生对前苏联与东亚的历史与教育史具有浓厚的兴趣,1921年他以全新的视角对前苏联的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苏联教育制度》一书,运用新史学方法对国外教育制度史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与探讨,并作了理论分析与阐释。同年,福利特纳(W. Flitner)出版了《世俗教育》,两年后又出版了《成人教育问题》,他另辟蹊径运用哲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教育史问题,使教育史研究克服了以往只注重简单叙述的缺陷,使之走上了理论解释的新轨道。1924年他又出版了《人民夜大学》,1941年出版了《大众学校思想的四个来源》,1947年出版了《西方教育的楷模与目标》,他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也论述了他对于教育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他认为德国过去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会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人们只是为研究而研究,只是鼓励一种无益的博学,在故纸堆中玩弄文字游戏,却忘了自己的研究使命。他强调研究教育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导我们当今的教育实践,使过去与现在成为一个连续的有机体。^②

在欧洲新史学派的影响和带动下,英国的布郎宁于1914年出版了《教育理论史入门》,为这一时期的世界教育史研究又添了亮点。在这一史学思潮的影响下,美国教育史学已基本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美国公

① [德]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② 吴式颖、任钟印主编:《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9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页。

立教育史诗模式。克伯雷(E. P. Cubberley, 1868—1941)的《教育史》(1920)是当时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著作。它阐明教育史发展与人类文明发展史其他方面的紧密联系,着重论述教育发展的总趋势,重视并阐明教育史上理论与实践的密切关系,成为20世纪早期世界教育史的代表性著作。他的《美国公立教育》的出版,更是美国教育史学体系形成的标志。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德国史学研究方法开始发生转向,标志性的事件是“菲舍尔大辩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史学界开始反思与检讨传统史学研究的缺失,出现了激进的史学流派,如汉堡学派和马尔堡学派,代表人物是菲舍尔(F. Fischer)。他向德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史学发起进攻,提出要同过去的史学全面决裂,倡导运用分析的方式去研究历史。此外,同时期在德国又兴起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思潮,那就是斯宾格勒(O. Spengler)所首倡的文化形态史观,主张打破“欧洲中心”论,从多种视角去研究世界历史,学会用文化的眼光去审视整个历史,实现史学研究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化。这样就引发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史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转向,众多史学家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这些史学新思潮对教育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教育史研究也开始寻求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并且走出了仅凭史料来论证史实的传统史学研究窠臼,逐步迈向采用分析、批判、阐释与跨学科研究方法为主的新领域。

在这种教育史研究方法的指导下,1953年出版了西奥多·李特(Theodor Litt)撰写的《德国古典陶冶思想与现代劳动市场》。通过分析与研究德国陶冶思想的历史变迁,从中汲取可以为现实服务的精华,特别是能够将陶冶思想与现代劳动市场联系起来去研究,体现了教育史研究走向跨学科、为现实服务的发展趋势。这就为教育史的发展走向标示了新的方向,也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使该学科从聚焦欧洲转向放眼世界、从理论圣坛回到服务现实。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与国际历史学研究的转向相一致,美国教育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史学观念和教育观念的更新,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视角从一元到多元,研究方法借鉴了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打破了与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之间的樊篱。美国教育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历了实质性的转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史学界受德国斯宾格勒倡导的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以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提出从文化角度去研究历史,他完成了12卷的《历史研究》(1934—1961),鼓励重新评价英国以外的文化,如西欧文化和北美文化等。主张从宏观方面去

整体把握历史,试图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哲学等角度去理解与阐释世界历史。受这一史学潮流的影响,一方面,出现了历史学家研究教育史的现象,历史学研究人员开始从教育史入手去解读历史;另一方面,教育史界也主动引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试图从整体角度去研究教育史,突破以往仅就专题或国别去研究教育史的思维禁锢。这个期间最有代表性的教育史学家就是布莱恩·西蒙(Brian Simon)。他将研究视野转向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首次从其他领域去探究教育问题。开始探讨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即“我们所要了解的问题是影响教育形势发展的环境”^①。他于1974年出版了《教育史研究:教育改革的政治策略(1920—1940)》,1991年又完成了专著《教育史研究:教育与社会秩序(1940—1990)》,还发表了一系列教育史研究论文,如1973年的《教育史研究》,1977年的《过去与现在的教育史》,1982年的《20世纪80年代教育史》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研究教育史,西蒙开拓了英国教育史的新领域。由于西蒙在该时期不仅教育史研究成果颇丰,而且观点新颖、思路开阔,所以他的研究成果被誉为“改变并重塑了英国教育史”^②。

20世纪20年代末,以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为代表,在批判以往实证史学视野不宽、只注重史料等不足的基础上,创立了年鉴学派,力求研究范型转换,主动打破历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地理学、人口学等之间的学科壁垒,主张从整体入手、在理解的基础上去研究历史,倡导从史料整理的误区中走出来,在理解的基础上去解读历史事实,并且将历史看做是人的历史^③,重点应研究影响人行为的心理、心态、社会因素等内容,强调历史研究应突破以往就精英人物思想进行研究的狭隘思维,而应将研究的视线转向群体、转向民众,并应善于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去体认历史发展的规律。年鉴学派的治史思想直接影响着这一时期法国教育史的研究方法,教育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关注整体、注重基层、重视阐释等研究倾向。在这种史学方法论的影响下,出现了从宏观角度去研究法

① [俄]卡特林娅·萨里莫娃、[美]欧文·V.约翰宁迈耶主编,方晓东等译:《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② R. Aldrich, *The Real Simon Pure: Brian Simon's Four-Volum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ngland*,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Spring, 1994.

③ 何兆武、陈啟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93页。

国教育史的著作,1922年出版了《中世纪法国和近代法国》一书,将教育史置于整个法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研究,试图将教育史与历史研究融为一体。1948年,马洛(H. I. Marrou)按照这种思路,又对古代教育作了追溯性的研究,出版了《古代教育史》。

在这种教育思潮的影响下,教育史研究人员将研究的视线向下转移到了中等教育的研究,因为欧美一些国家普遍认为培养科技杰出人才的关键是中等教育,要打好基础,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批研究中等教育史的研究成果,如1936年出版了韦伊(G. Weill)的《法国中等教育史》,重点研究了法国中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以期从中总结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同年,又出版了维亚尔(F. Vial)的《中等教育百年史》,通过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了欧洲各国的中等教育发展概况,从宏观角度审视了中等教育百年发展史上的利弊得失。

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年鉴学派正处于繁荣与流行时期,费弗尔提出了历史研究中政治史研究不容忽视,而且重心要下移,将研究精英人物转向民众与基层。受这一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教育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研究工人教育、普及教育与技术教育的热潮,相继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曼德罗(R. Mandrou)、马奇布莱德(R. Muchemled)、梅特龙(J. Maitron)等人对法国的工人文化与教育、民众的普及教育、通俗文化教育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将研究的视线下移到向来都不被人们重视的社会最下层。曼德罗强调要重视人民创作的作品和工人所接受的教育,多了解贫困徒工的学习与文化状况;^①梅特龙强调应重视成人讲习班、学徒班的教学、组织,要注重阅览室、图书馆的管理,以期人们对下层民众的生活与学习有更多的了解。^②勒古(Y. Legoux)在《狄德罗职业培训学校》一书中指出,像狄德罗学校这样的培训场所,尽管不是培养专家的学校,然而它对体力劳动工人的子女寻找职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③英国布莱恩·西蒙(Brian Simon)于1960年出版了《教育史研究:1780—1870》,倡导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与思考教育史问题,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中下层民众,而且运用一定的理论来指导教育史研究,从而增强了教育史

① R. Mandrou, De la culture populaire aux XVI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Stock, 1965, p. 224.

② J. Maitron,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Paris, les Editions ouvrières, 1964.

③ Y. Legoux, Du compagnon au technicien: l'Ecole Diderot et l'évolution des qualifications. Paris, Technique et Vulgarisation, 1972.

研究的主体意识。此外,这一时期尽管法国教育史在教师培训中的地位不像英国那样突出,只是一般的教学课程,而且以往总是没有教材,只是借助翻译德国编写的教育史作为教学用书,到1968年,安托万·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完成了亲自编写的《法国教育史》(1800—1967)教材。这部教材由于构思精到,叙述得体,论述严密,所以至今一直重印,仍作为教师培训的教材。^①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尽管不太多,但是展示了教育史研究取向的转变,打破过去单一的就教育而论教育的思维模式,出现了与历史学对话与沟通,并从史学界吸取有益的研究方法的良好势头。教育史研究出现了向外延伸与向下扩展的态势,出现了一些从研究上层下降到民众的研究成果,从研究精英扩展到群体的教育史著作。这是教育史研究受当时流行的年鉴学派史学观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为下个时期出现更丰硕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年鉴学派”这一名称已逐渐无法概括和涵盖所有的史学新潮流,人们逐渐使用“新史学”一词来作更大的综合。^②以第二代年鉴学派核心布罗代尔(F. Braudel)为转折,到第三代的核心勒高夫(J. Le Goff)、孚雷(F. Furet),年鉴学派已演变成了新史学流派。“新史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包含了许多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力图拓宽过去狭隘的研究视野,不断创造新的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思路也影响到了教育史研究。正像当时法国有的教育史学家所说:“毋庸置疑,这些趋势必然会影响到教育史学者的工作。”^③按照夏蒂埃(R. Chartier)的说法,法国教育“新历史学”的出现表明,学术性、思想性或专题性的史学正在向寻求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努力的新途径方面过渡。^④在新教育史学理念的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教育史研究进入了辉煌时期,成果纷呈,论著颇丰,法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

受历史学研究风格的影响,法国教育史研究也倡导在完全理解史料

① [法]玛丽·玛德琳·康比尔:《当前欧洲采用的教育史教科书》,载[俄]卡特林娅·萨里莫娃、[美]欧文·V.约翰宁迈耶主编,方晓东等译《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② 何兆武、陈啟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06页。

③ A. Léon,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s faits éducatif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0. p. 248.

④ R. Chartier, Education, In: Le Goff, J., ed, La nouvelle histoire, Paris, Retz, 1978, p. 156—158.

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历史,充分体现教育史编撰者的主体意识,在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是1975年由雷莫·福尔纳卡(Remo Fonaca)撰写的《教育史研究》,还有1980年出版的由安托尼·莱昂(Antonine Leon)所撰写的《教育史导论》,这两部书均由来自同一职业团体的作者所撰写,通过认真的分析、流畅的阐述,以使更多的学生从中受益,目的是按新史学的写史方法去编写适合于教育专业的最理想的教材。“他们的目的是通过从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所选用的例子,论证历史与历史认识论的一致性和对未来教师的实用性,从而证明历史在其他教育学科中的地位是正确的。”^①这两部教材是该时期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教育史教材,在法国教师培训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此外,还有1979年出版的《教育的社会历史》,是由安东尼奥·圣托尼·鲁古伊(Antinio Santini Rugui)撰写,该书将教育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来理解与阐释,在理论和实践上他们一直强调所有教育的社会影响和阶级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分析自古代奴隶社会以来的各种被压迫阶级的教育发展情况。佩里奥特(J. Perriault)于1981年撰写了关于教具研究方面的专著,追溯了幻灯机、留声机在教学中的发展历程及其所起的作用。1982年出版了诺埃尔·泰罗(N. Terrot)编写的《法国成人教育史》,作为成人教育与培训的教材。1984年又出版了拉波雷沃特(G. Laprévote)写的《1879—1979年法国的师范学校》作为教师培训的教材。

同时,新教育史学研究在研究方式上也有新的发展,即一改以往仅靠个人单打独斗的研究格局,要求研究者联合起来形成群体,方能适应新形势下对教育史研究的需求。为此,自从对传统史学研究提出质疑,力求探寻教育史学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之后,世界各国相继成立了用来组织团体研究力量的教育史学术团体。如:1967年英国教育史学会在利物浦成立,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组织和团结一批有志研究教育史的力量,便于在该领域整体作战,多出成果。1973年德国教育史研究协会成立,从此德国教育史研究人员在协会的协调与统领下,通过经常性的学术交流可以朝着协会导引的方向去努力,避免了研究课题的重复劳动,可以有效地集中人力搞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同时,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便于集中大家的智慧去尝试新的研究方法,这就有利于德国教育史研究走上高效的研究快

^① [法]玛丽·玛德琳·康比尔:《当前欧洲采用的教育史教科书》,载[俄]卡特林娅·萨里莫娃、[美]欧文·V. 约翰宁迈耶主编,方晓东等译《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车道。协会成立之后,教育史研究领域不断出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with 理念,代表性的著作有 1978 年出版的由布雷岑卡撰写的《元教育理论: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基础导论》,将教育史学理论纳入元教育理论之中去思考与探究,显示了作者欲将教育史学科中的教育特色体现出来的研究本旨,倡导运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反补教育史研究的缺失。

教育史界以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做了不少新的尝试与探索,如 1982 年赫威西·布伦克茨(Herwig Blankertz)主编了《从启蒙时期到现代的教学法》,试图从了解教学法、学校、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目的出发,去追溯德国教学发展的演变历程,分四个时期对德国教学史进行了研究,包括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古典时期、工业化时期和从魏玛至波恩时期,运用分析与阐释的研究方法对德国的教学发展史进行了研究。同期出版的《教育史最新发展的基本特征》,作者海因·艾尔玛·特诺思(Heinz·Elmar Tenorth)则本着体现教育史的学科特色、力求教育史与历史学相区别的宗旨,突显教育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风格与特色,同时也展示了教育史未来发展的趋势与走向,是一部研究教育史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

值得强调的是,由米亚拉雷和维亚尔(J. Bial)主编的四卷本《世界教育史》于 1981 年出版。这套书是该时期最具魅力的一部教育史巨著,共有 40 多名教育史研究人员参加了编撰,而且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它横跨世界各地、纵贯数千年,尽管研究的重心在近现代教育的回顾与剖析,但也不乏对古代教育传统的追溯与钩沉,可以说是当时最完整的一套教育史著作。该书打破了以往研究教育史以欧洲为中心的固有模式,不仅研究欧洲的教育发展情况,而且探讨东亚、中亚、西亚、南美等地区的教育演变历程,真正从全球的范围内对教育史进行研究。这是受到了法国新史学思潮中的整体史学观和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中多中心史观的影响,力图从多角度、多层面、多中心去研究世界教育史,以形成宏观、立体、多维的世界教育史格局。为了实现这样的治史目的,作者改变了过去教育史只重研究教育思想史、机构史、教育理论发展史的传统模式,将研究的视线移向了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管理、教学实践等领域,使教育史研究实现宏观与微观的统一。还在研究学校教育史的同时,关注了社会教育史与家庭教育史。这就不仅使教育史的研究视野大大开阔,而且实现了教育史研究与历史研究的有效沟通。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教育史研究领域进入了学科反思阶段,一方面思考教育史学科的性质、学科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反思教育

史研究的方法、与历史学科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著作。1985年作为国际教育局编著的“教育科学丛书”之一、由法国教育史学家安多旺·莱昂编著的《当代教育史》英文版出版,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首先,对当代教育史学科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围、研究方向、学科整合等进行了深入思考;其次,对教育变革中教育观念的变革、大众教育、技术教育等作了认真分析;再次,对教育史研究的功能、意义与价值作了新的思考。莱昂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同时吸收了法国史学界关于年鉴学派与新史学运动的一些新观点,将之精华部分巧妙地运用到了教育史研究之中,体现了教育史学与历史学的沟通与合作。1981年,由普罗斯特(A. Prost)主编的《法国教育通史》出版,这是一部大部头的教育史学著作,为法国教育史作出了巨大贡献。1983年出版了由雷翁(A. Léon)撰写的《法国民众教育史》,将教育史研究的重心由精英下移到民众。他于1986年又出版了《法国教育史》,运用新教育史学的研究方法重新编写了法国教育史,使之有一种全新的感觉。还有1988年阿历伽德罗·提阿那·费列尔(Alejandri Tiana Ferrer)撰写的《当代历史教育的调查:焦点与方法》,重点论述了教育史在教育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突出教育史在丰富学生知识、开拓视野方面的重要作用;还对教育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刻反思;运用比较的方法将欧洲的教育史与美国作了对比研究,以期从中感悟教育史研究的得失,旨在为以后的教育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另外,在探索德国教育史教材建设方面也作出不少成绩,1987年伊格尔·比茨(Egle Bechi)撰写的《教育史》,就是一部有别于其他教材的专著,他首次将编撰教材的重点放在让学生了解教育实践的演变历程上,力求实现教育史教材由教育思想向教育实践的转变,同时也介绍了教育体制的演变情况,这部教育史教材就是在新史学背景下所撰写的教育史著作,明显突破了以往研究的传统模式。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1997年出版了由米茨尔(G. Mitchell)撰写的《德国大学:过去与未来》,对德国研究型大学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分析,为现代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借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全神贯注,构建了自己的教育史学理论体系,并根据自己的理论体系开始了重新阐释美国教育经验的尝试,这种努力主要反映在他的专著《公共教育》和《美国教育传统》之中。在去世前的25年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美国教育:殖民时期的经验(1607—1783)》、《美国教育:建国时期的经验(1783—1876)》和《美国教育:都市时期的经验(1876—1980)》三部著作上。在克雷明看来,应

该将“教育”视为通过周密的、系统的和持久的努力来传播或激发知识、态度、价值、技术和情感的过程。这个定义强调重视个性与教育机构的多样性。从个人受教育的多样化来看,除学校教育以外,还包括来自父母、同辈、兄弟姐妹、朋友的影响;而从教育机构的多样化来看,除学校教育以外,还包括家庭、教堂、图书馆、博物馆、夏令营、慈善团体、农村集市、住宅区、工厂、电台以及电视网络等。克雷明从教育生态学视角来看教育,重视对于教育的多元综合分析,尤其重视教育的社会环境,看到了家庭环境、学校环境、校外教育机构和渠道的教育作用。克雷明倡导的大教育观首先使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得到大大的拓展。以往的美国教育史将重点放在学校教育尤其是公立学校教育的历史研究上,而现在学校教育不再处于教育史研究的中心,家庭、教会、学校、学院、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场所(如工厂)、军队、童子军、报刊、讲读社、展览会、济贫院、大众识字教育等等,都一起被纳入了美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

美国的另一位教育史学家乔尔·斯普林(Joel Spring)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多元文化教育、土著美国文化、全球教育、人权教育和教育政策,其教育史方面的代表作是《美国学校:1642—2000》。斯普林强调他写作《美国学校》的目的是在广泛观察的基础上阐述教育史,以便为教育史教学提供一种新的综合的途径。他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多元文化等多种视角来阐释美国学校史,并主张把各种阐释都摆在学生面前,使他们得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评判教育史。他明确指出:“在历史阐释中无所谓正确与公正”。“在历史阐释中没有公正的答案,而只有对于哪些历史阐释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你必须根据你自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价值观作出决定。”^①虽然这种说法有着浓厚的历史相对主义色彩,却是当代美国历史学发展趋势的一种真实写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的理查德·奥尔德里奇也将研究的重心下移到了民众教育、扫盲教育、初等教育、教师教育、教学活动和课程设置等具体的教育活动史,1990年发表了《19世纪中叶的初等教育、识字和童工》,论述了在国际捐助初等学校的教学与课程中的识字、教育和童工问题。^②为了向缺乏教育史知识的人普及历史知识,他还编写了浅显易懂的

^① Joel Spring, *American School: 1642—2000*, Fifth Edition, Boston: McGraw-Hill, 2000, p. 2.

^② Richard Aldrich, *Elementary Education, Literacy and Child Employment in Mid Nineteenth Century: A Statistical Study*, in: G. Genovesietal, *History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Hanover, 1990.